

略论吐鲁番、敦煌出土 《三国志》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

肖瑜

(广西大学文学院, 南宁 530004)

[摘要] 回顾以往学者在出土文献、传世《三国志》版本、六朝文字三方面的研究成果, 发现开展对吐鲁番、敦煌等地出土的《三国志》六种古写本的用字研究, 具有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、完善《三国志》版本研究、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等三方面的意义。

[关键词] 吐鲁番; 敦煌; 《三国志》; 出土古写本; 用字研究

[中图分类号] H028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1-8182(2008)04-0079-03

近百年来, 敦煌吐鲁番地区共出土《三国志》古写本残卷六种, 分别是: 现藏于新疆博物馆的《吴志·吴主传》、《魏志·臧洪传》, 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《吴志·步骘传》, 现藏于日本上野氏的《吴志·虞翻陆绩张温传》以及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的《吴志·虞翻传》、《吴志·韦曜华覈传》。已有的《三国志》古写本研究, 主要集中在古写本著录、书法、校勘、辨伪、语言文字、纸张等方面, 较少涉及古写本的用字研究。本文重点讨论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问题。

古写本用字, 主要包括古写本俗字和通假字两方面的研究。综合考察《三国志》古写本用字研究在魏晋六朝文献、语言研究等方面的意义, 笔者认为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 1. 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; 2. 完善《三国志》版本研究; 3. 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。下面就这三方面略作论述, 不当之处, 祈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

古写本《三国志》的研究, 是出土文献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。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, 简帛研究已经超过甲骨文、金文、敦煌等出土文献的研究而成为

目前出土文献研究中最热门的课题, 成果日新月异。

出土简帛古籍的研究价值, 李学勤、裘锡圭、李零等先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述^①。而出土文字的考释工作, 也取得了扎实的成果。各种文字编^②相继问世, 为汉字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出土文字研究成果的汇集整理工作, 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《古文字诂林》的问世, 给古文字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, 为上古时期汉字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 同时也为魏晋时期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溯源的资料, 为《三国志》古写本用字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参照的大量前代文字史料。

1996年, 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三国吴简。1999年,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荆》, 吴简开始受人瞩目。但《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》的撰写者却认为“本世纪以来, 吐鲁番及敦煌曾出土六种《三国志》写本残卷, 但其史料价值并不大。”^{[1]42}

出土的吴简, 大大丰富了三国时期历史文献。《三国志》古写本在反映当时吴国的历史情况方面的价值或许不如出土的吴简, 但并不等于说古写本研究的价值就不如出土吴简。关键在研究角度的不同。

收稿日期: 2008-03-31

基金项目: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科研项目(桂教科研[2006]26号); 广西大学科研基金项目(X061159)

作者简介: 肖瑜(1978-), 男, 江西泰和人, 广西大学文学院讲师, 博士, 研究方向: 汉语史与敦煌吐鲁番文献。

① 李学勤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(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01年版)、裘锡圭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2年版)、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论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2年版)、李零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(北京三联书店, 2004年版)等。

② 如曾宪通《长沙楚帛书文字编》(中华书局, 1993年版)、陈振裕《睡虎地秦简文字编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, 1993年版)。

江学旺进行的敦煌出土正史写本辑校工作,对于敦煌文献中的正史残卷进行了集中校正(参见:江学旺《敦煌写本正史辑校》,浙江大学博士 后学位论文,2003年),于《三国志》的写本,只涉及了敦煌出土的《步鹭传》残卷。惜其为范围所限,未能囊括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另外五种《三国志》古写本。

作为吐鲁番、敦煌出土文献的《三国志》古写本,其研究较为薄弱,有待加强。其用字研究,是解读《三国志》古写本残卷首当其冲的问题,亟待开展。

二、完善《三国志》版本研究

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卢弼《三国志集解》和易培基《三国志补注》两部成果丰硕的巨著(参见:卢弼著《三国志集解》,中华书局,1982年版;易培基著《三国志补注》,台北艺文印书馆,1955年版)。然而,由于学者的主观原因(如卢弼怀疑古写本)和客观因素(易培基过早逝世),这两部著作对于传世宋本的文献价值都未能充分利用,至于《三国志》古写本,只停留在最浅层面的应用。

中华书局标点整理《三国志》时,虽然利用了当时可见的《虞翻陆绩张温传》古写本,但也没有充分利用该古写本的校勘价值。业师吴金华先生在点校本《三国志》(吴金华点校《三国志》,岳麓书社,1990年版)中,充分利用《吴主传》、《虞翻陆绩张温传》、《臧洪传》、《步鹭传》等古写本,校勘宋本《三国志》正文达23处之多。纵使如此,古写本在《三国志》文献整理研究中也只是发挥了一部分校勘方面的作用。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俗字和通假字,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。

六种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中,时代最早的《吴主传》,可能是东晋初年的抄本,最晚的《韦曜华覈传》可能是唐初写本。这些抄本中所用当时的俗字,非常丰富。而到了唐末版刻兴起之后,宋咸平、绍熙本《三国志》中,这些俗字大都被通用的版刻规范字体代替,至明清的《三国志》刻本,其中的俗字比例更是少之又少。

笔者以现在最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参照系,将六个古写本与《三国志》传世诸本(宋咸平本《吴志》、绍熙本《魏志》,明南监本,清殿本,金陵书局本)相同内容的用字情况作了统计调查。我们发现,与传世宋、明、清诸本相比,古写本俗字非常丰富。下表所示即为统计结果。

六种古写本残卷可识别的总字数3155个。除去重复,共计使用汉字646字,出现俗字316个。从各古写本俗字占使用汉字总数的比例来看,最低的是《虞翻传》39.08%,最高《步鹭传》则占到47.79%。六种古写本使用俗字的平均比例为43.2%。

而从版刷印刷之后,俗字的比例就已经降到了10%

古写本名称	总字数	不重复汉字数	不重复俗字数	俗字所占比例 (不重复计算)
吴主传	562	322	131	40.68%
虞翻陆绩张温传	1072	500	233	46.60%
虞翻传前篇	107	87	34	39.08%
臧洪传	375	215	92	42.79%
步鹭传	437	272	130	47.79%
韦曜华覈传	602	362	153	42.27%

以下,如宋本为7.55%,明本为4.88%,清殿本为3.8%,金陵书局本更是降到了最低的1.71%。

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出《三国志》在流传过程中,不同时代的版本用字情况很不相同。对比现存最早的古写本俗字以及历代版本用字进行研究,对于传世本《三国志》版本文字的清理工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。到底哪些俗字在从古写本演变到宋本的过程中保留下来了,哪些俗字淘汰了?从宋本到明本,又有哪些俗字保留下来了,而哪些俗字被淘汰了等等,这些问题,属于《三国志》版本用字演变研究的范围,也是《三国志》版本研究的薄弱环节。

通过对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俗字的研究,可以为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来自古写本方面的准确信息。这就是古写本在完善《三国志》版本研究方面的意义。

三、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

对于《三国志》这部传世文献的整理校勘,六种古写本不可回避、不容忽视。古写本集中反映了东晋至唐初这一时段的文字面貌,对其用字(俗字、通假字)进行研究,对于揭示六朝时期用字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纵观上古到隋唐五代时期汉字的研究,呈现出两头大,中间小的总体态势。所谓“两头大”,一头是指甲金文、战国简帛文献、出土秦汉文字的研究。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呈现上升趋势,《古文字诂林》及其它一系列成果的出版就体现了这一点。另一头,则是隋唐五代俗字的研究,其成果较多,且很有分量。如潘重规《敦煌俗字谱》(参见:潘重规《敦煌俗字谱》,台北石门图书公司,1987年版)、张涌泉《汉语俗字研究》、《敦煌俗字研究》、《汉语俗字丛考》(参见:张涌泉《汉语俗字研究》,岳麓书社,1995年版;《敦煌俗字研究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6年版;《汉语俗字丛考》,中华书局,2000年版)、黄征《敦煌俗字典》(参见:黄征《敦煌俗字典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5年版)、郑贤章《龙龕手镜研究》、蔡忠霖《敦煌汉文写卷俗字及现象研究》、齐元涛《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》等。

其中张涌泉对于敦煌俗字、汉语俗字的研究开

创了近代俗字研究的新局面。黄征所编《敦煌俗字典》，搜罗甚广，是目前收录敦煌俗字最丰富的工具书，在敦煌俗字研究乃至汉语俗字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。郑贤章《龙龕手镜研究》于五代俗字研究用力甚勤，考辨出大量疑难字形，发明甚多。蔡忠霖从俗字史的角度，对不同时代敦煌写卷中的俗字进行了初步的断代研究。齐元涛对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构形系统作了详细研究，探索了碑志楷书的理据状况，论析了一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特殊现象。

所谓“中间小”，即六朝俗字研究，这是俗字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。对六朝俗字进行断代的研究，可见的成果非常少。目前来看，涉及六朝俗字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欧昌俊、李海霞《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》、刘延玲《魏晋行书构形研究》、郑婕《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研究》等。

《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》对于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的类型、特点、产生原因、源流和意义作了研究，成果颇丰。但该书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陷，那就是在具体探索俗字形成的原因时，很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六朝时期俗字形体的来源，常常是从六朝某一俗字形体的本身去寻找该字形产生的原因。

刘延玲《魏晋行书构形研究》从字体和构形相结合的角度，在汉字与书法的关系上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，归纳出行书字体结构变异的一些规律，对六朝时期俗字形成原因作了有益探索。然而因其取材有限，导致一些魏晋新兴的行书字形没有纳入其研究范围。郑婕《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研究》对以魏晋南北朝简牍为载体的中古隶楷文字进行定量调查研究，梳理古文字到今文字阶段的传承演变情况。其结论是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是走向成熟阶段的楷书，其笔画、构件系统已经建立，但还不完善和成熟，笔画、构件的形态和数量等还不确定。从字体风格看，是出于隶书向楷书阶段过渡的隶楷文字，该时期文字仍然是表意文字系统。

六朝俗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，并不意味着该时期俗字现象没有研究价值。从研究材料之丰富性和研究角度之多样性来看，六朝俗字研究大有可为。

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作为抄写时间上限为东晋时期，下限为唐代初年的出土文字材料，其字形结构、字体，都集中反映了东晋——唐初的文字特点。残卷总字数加起来虽不及《三国志》的百分之一，但作为六朝俗字的研究对象，已经足够为六朝俗字断代研究提供一批活生生的材料。全面调查六种古写本《三国志》的俗字总量而得出的结论是：六种古写本

使用俗字的平均比例为 43.2%。这么高的俗字使用率，清晰地反映出东晋到唐初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丰富的俗字现象。从横向和纵向对这些俗字的研究，不管是对《三国志》语言文字的整理，还是对中古俗字的探求，都是非常必要的。

现有的关于六朝通假字的研究，散见于各类有关研究专著以及通假工具书中，对六朝文献通假字的专题性研究成果还很少。本文对于《三国志》古写本用字中的 33 个通假字进行集中研究，有助于认清六朝时期通假字的真实面貌。

笔者认为，以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俗字为研究重点，兼顾通假字研究，可以推动六朝用字研究的进程：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为研究点，彻底查清哪些是六朝新兴俗字，哪些是传承六朝之前已有字形的俗字。通过全面研究，归纳总结出六朝时期俗字现象的规律性的东西。集腋成裘，只有对《三国志》古写本俗字这样的专题研究积累多了，才可以为六朝俗字的整体研究探索方法、提供素材、总结规律，才能够逐渐形成有规模的六朝整个时代层面的文字研究，从而逐渐促进六朝用字研究进程。而《三国志》古写本通假字的研究，对于揭示六朝时期通假用字的真实面貌也具有重要价值。

四、结 语

综上所述，对《三国志》古写本用字开展专题研究，可以促进出土文献研究的完善，可以弥补《三国志》版本研究的薄弱环节，可以推动六朝用字研究的深入发展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走马楼简牍整理组.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嘉禾吏民田家荊(上)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99: 42.
- [2] 三国志[M]. 陈寿, 吴金华, 点校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0.
- [3] 张涌泉. 敦煌俗字研究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96.
- [4] 刘延玲. 魏晋行书构形研究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[5] 齐元涛.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7.
- [6] 江学旺. 敦煌写本正史辑校[D]. 杭州: 浙江大学博士后学位论文, 2003.
- [7] 郑婕. 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研究[D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, 2007.

(责任编辑: 韦家朝)